

话语权视角下世界大学排名影响力研究

世界大学排名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评价工具,其影响力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历波动起伏的运行轨迹,反映了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复杂性。

世界大学排名影响力的强弱始终受深层社会结构的制约,话语规则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排名影响力的初期快速获得源于全球高等教育场域内三大实践趋势的交汇,促成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需求,排名因此产生了影响,塑造了教育决策与高等教育机构的战略方向。这一过程中,排名与当时的问责制、质量保障趋势及数字理性的主流理念相契合,确保其影响力的常规化展现。随着3种实践趋势的持续推进,利益相关者诉求不断扩大,排名公司借此将其主体性权力转移至自身。排名工具的权力通过内部话语规则的自强化作用,进一步放大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推动影响力的持续增强。然而,近年来,全球高等教育实践趋势的细微变化导致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分化,商业主体的权力也受到知识权力挑战,排名的影响力基础因此动摇。与此同时,禁律效应、社会占有原则等多重话语规则的失效,使排名面临来自外部批判的风险,影响力逐渐式微。

排名影响力的变化不仅受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还受到话语规则的制约。在社会权力结构决定排名影响力存在的基础上,排名影响力的强弱受到话语规则的调节、催化或削弱。排名影响力的增强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表明顺应时代主流话语体系(如问责制、数字理性)的内部控制规则,以及话语逻辑和内涵自强化的外部控制规则,均能强化话语实践的权力。排名影响力的危机也警示我们,话语实践嵌入官方话语体系对于维持其权力稳定较为重要,此外,话语实践的历史性和实践性表明话语权

力具有非连续性和偶然性——随着全球高等教育领域3大趋势发生变化,尽管世界大学排名依然秉承相同的基本逻辑和形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下,排名的影响力依旧会因此波动。

排名影响力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话语规则对话语实践的影响,也折射出话语权力的基本属性——历史性、非连续性与偶然性。排名的影响力受到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和话语规则时空的制约,必须在所处场域结构中分析其权力问题,体现话语权力的历史性。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大稳定趋势,但是,技术变革和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新空间等非预期发展也影响其演变,这种非线性变化导致排名影响力的不稳定,体现了权力的非连续性与偶然性。排名影响力的产生,基于诉求的集结及其对主流话语的顺应,然而这一过程是后期理论解构的结果,而非预先规划。

对世界大学排名影响力中权力结构的剖析,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排名影响力的权力本质及其变化背后的社会结构与话语规则,还能为未来合理运用世界大学排名提供指引。在排名影响力持续存在的前提下,从“政府-高校-市场”这一变动的权力结构来看,政府与高校作为关键行动者,依然能够自主决策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使用排名促进自身发展,即排名影响力的限度问题。同时,场域格局的变化为排名之外的新型治理工具和理念的出现提供空间。中国可以结合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中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诉求,探索新的理念与工具,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哲学与智慧的传播,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摘自《现代大学教育》,2024年第6期,作者:康云菲 刘宝存)



新形势下科技人才评价的校准

校准目标导向，支撑国家战略落地实施。科技人才评价制度受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战略等关键因素影响。外部环境变化时，人才评价制度必须及时调整和优化。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的人才核心要义，在于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国家战略攻关领域，解决关键科学技术实际问题，并作出实质性创造性贡献。我们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聚焦战略科学家和高精尖创新人才比较匮乏等现实问题，探索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的新标准、新方式、新机制。

校准政府角色，促进人才发展治理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紧密配合。在科技人才评价实践中，政府应致力于通过基本制度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手段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人才发展环境。我们要合理把握政府作用发挥边界，使用人主体真正拥有用人自主权。要推动政府由计划式管理过渡到党管人才格局下的跨部门协同治理，通过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和人才发展治理的现代化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校准改革视野，推动全局和局部改革相配套。人才评价之所以是“风向标”“指挥棒”，根本在于评价结果会应用到人才发现、引进、使用和科技资源配置上。当前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治标和治本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从科技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健全符合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用人制度。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视野下统筹职称制度改革，在科技资源配置的视野下统筹人才计划和人才资助项目。（摘自《中国人才》，2024年第12期，作者：孙一平 孙锐）

高校数据权的立法原则。第一，“数权法定”原则。任何组织或个人对高校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加工、使用等任何操作之时，均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第二，“一数多权”原则。**高校数据具有多元主体、多重价值的特点，从而在立法上必须明确高校数据权的具体权益，如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使用权、加工权、收益权、处分权、管理权、控制权、使用许可权、知情同意权、自决权、修改权、删除权、被遗忘权、可携带权、共享权等。**第三，“一数一源”原则。**从立法层面规定政府部门在保障高校数据权方面应履行的职责，即构建高校数据共享平台，避免数据的多源头、重复、任意采集。

大数据时代高校数据权的立法保护

高校数据权的立法建议。第一，基于高校数据权属性的立法建议：（1）对于高校的常规性数据、公开性数据要侧重保护其私权属性，要从立法上提高其法律地位，将高校个体数据权提升至与企业、个人并行的法律地位，保护高校的个体名誉及其经济利益。（2）对于大范围内的高校数据或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数据要侧重保护其公权属性，从立法上重点保护高校的集体数据权。**第二，基于高校数据权类型的立法建议：**（1）高校对其自身产生的数据享有数据权，除国家主管部门外，其他任何机构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采集、使用、处理。全国高校的集体数据权应作为国有资产归国家或者国家主管部门享有，任何机构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采集、使用、处理。

（2）明确规定高校所享有的原始数据权，如管理权、控制权、使用许可权、知情同意权、自决权、修改权、删除权、遗忘权、共享权。明确规定高校基于其原始数据权，对第三方机构所享有的派生数据权，如损害赔偿权、删除权、修改权等。第三方机构收集、整理、处理高校数据须经过国家主管部门资质审核和授权许可，或者高校委托、授权。（3）未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校成果数据，我国知识产权法要吸纳修订，或者在数据法的相关立法中增加规定；高校记录数据要在立法上偏重程序正义；高校自然数据要在立法上偏重实质正义。（摘自《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3期，作者：尚趁）

发展应用型高校需要准确把握的几个关系

准确把握办学定位与特色发展的关系。应用型高校要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紧密对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的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需要学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 and 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并注重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提升方面积极探索。

准确把握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应用型高校要主动适应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构建与当地新兴产业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民生改善需要更加适应,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优化专业点设置;积极参与行业标准、企业用人标准制定,构建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联动机制,实现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与行业企业实现互补发展、同频共振、融合创新,持续强化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行业产业属性,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准确把握学科和专业的关系。应用型高校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专业建设,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教学,特别是本科生教育,以培养更多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一所高校要真正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还是要抓学科建设。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学校可支配的资源有限,学科建设不能盲目地全面铺开,要科学调配、集中力量,重点建设若干个基础好、特色优、应用强的学科。(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24年第23期,作者:常婉茹 刁玉华)

美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变迁规律分析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经历了先稳定扩张、再明显收缩的变化过程,高等教育规模的顶点出现在2010年—2013年左右,之后高等教育机构与入学总人数随适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而减少。高等教育规模区域分布的特征是与区域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8以上。虽然近年来高校总数有所下降,但研究型大学的数量仍持续增加,体现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上升;研究型大学的分布呈现分散与集中并存的特征,即每个州都有分布,但在加州、纽约州等地高度集聚。学科发展与区域产业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相关性,但不同学科与相应产业的相关性存在差异,相关产业和相近学科都会对学科发展产生影响,应形成学科群与产业链互动的系统性视角。

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实践启示及研究展望。第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自2013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至2020年仅七年时间就减少了约一千所。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今后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也面临收缩的可能,进一步

研究美国在院校关停或合并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对于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整具有参考价值。第二,从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与人口和GDP的相关性来看,美国高等教育有“高地”而没有明显的“洼地”,相关系数很高,充分结合各地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仍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三,美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布局呈现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特点,同时与区域经济充分融合。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也大致符合这样的布局特征,即基本上每个省份都有分布,同时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高度集聚。我国广东省与美国加州在常住人口和经济总量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广东高水平大学的发展还稍显不足,浙江也存在这种情况,两地均应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第四,从学科与产业的关系来看,从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只设“一流学科”、不设“一流高校”的政策调整中可以看出,我国愈加重视学科作为育人和科研基本单位的核心作用,旨在让学科与产业、学科群与产业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摘自《复旦教育论坛》,2024年第5期,作者:徐娥 赵文学)

第二十八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第二十八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高校党建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扎实做好高校党建工作，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丁薛祥强调，要深刻认识高校党建工作的新使命新挑战新要求，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校何为”的时代命题。（摘自新华网，2024-12-20发布）

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工作会召开

12月26日，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工作会在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怀进鹏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科技大会都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战略部署。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谋划如何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合纵连横”打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络体系，以平台为支撑、以服务为核心、以政策为保障，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有机融合政府政策要素、高校知识要素、企业创新要素、资本资金要素，利用发挥好国内统一大市场，赋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构建梯次衔接的平台体系，让科技成果实现“三级跳”，建好国家大学科技园，系统布局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构建更加积极的评价体系，加快提升成果转化效能，更好服务国家整体创新，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经济体系作出教育贡献。（摘自教育部网站，2024-12-26发布）

《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布

近日，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显示，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64595.04亿元，比上年增长5.33%。2023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60582.1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00%。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方面，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40813.92亿元，比上年增长3.97%。其中，中央财政教育经费5907.53亿元，比上年增长3.4%。从生均经费增长情况看，202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22453.04元，比上年增长1.12%。增长最快的是海南省（51.70%）。（摘自中国教育在线，2024-12-27发布）

山东省高校主动服务和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

12月20日，山东省高校主动服务和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经验交流活动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刚出席活动并讲话。近年来，省教育厅党组高度重视服务和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工作，实施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八大工程”，统筹推进相关任务落实。全省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确定目标任务，创新工作方法，有力推动了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落实落地，有效带动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摘自山东省教育厅网站，2024-12-21发布）